

# 民国时期的藏语言文字研究

王启龙（清华大学文学院 北京市 100084）

**摘要：**藏语言文字及其相关领域从来都是藏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一般来说，学术界对解放后的情况比较熟悉，对 1949 年以前的情况相对陌生，曾有学者写过少数民族语言学史方面的著作。而本文专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境内在藏语言文字及其相关研究方面的主要学者及其著述作一简述，在资料上力求详尽一些，为学术界查检过去的研究成果提供方便。

在 1911 年以前，中国藏学研究语言文字领域的成果寥寥。民国以后，逐渐出现了有关的论文、专著、译文、译著，数量不多，但其中却有掷地有声、不同凡响，开一代先河的经典作品，比如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等先生的语言学论文；高本汉著述的汉译；于道泉先生译注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抗日战争（1937）以后，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被迫南迁和西移，主要集中在西南及西部省区，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学者们为了救亡图存，边疆研究越发深入；此外，客观上身处边疆民族地区也为他们进行田野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边疆研究成果卓著，其中藏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也是如此，闻宥、罗常培等名家的语言学论文、林林总总的藏汉语词典，为新中国诞生后的藏语言文字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分“文章”和“书籍”两部分，各部分又以 1937 年为准，分前后两个阶段。

## 一、文章

1937 年以前的文章不多，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统计，藏语言及其相关文章只有 7 篇，大多是当时著名语言学家的著述或国外著名学者著述的译介。这里值得简要介绍如是：

西夏王朝与中原和吐蕃的历史文化关系，渗透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方方面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极为重要。王静如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和“中台藏缅数字及人称代名词源试探”均是本时期汉藏语研究方面的力作。前者以丰富的语言材料对西夏文字汉藏译音进行了对勘比较、分析研究；后者通过中、台、藏、缅诸语言 1 至 10 的数字和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从一个侧面探询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渊源关系。罗常培的“梵文颚音五母之汉藏对音研究”从梵文颚音五母入手，利用梵藏汉语言史料论证了汉藏语音的对应关系，论证十分严密，结论颇为客观。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被誉为“非汉语（即少数民族语言）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先生（1902—1987）早在 1933 年就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英文）一文，提出“古藏语中送气不送气清音之互补现象乃是前缀音对后面声母影响的结果”的结论，是为中国藏学界藏语语音学方面的第一篇力作。

德拉格诺夫（今译龙果夫）著的“古藏文诸浊破擦音”（英文）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古藏文语音问题的学术论文。此外，君实翻译的“藏语的特征”和高本汉的“藏语与汉语”都是通论性的文字，前者对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基本特征作了介绍；后者对藏、汉语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基本探讨。

另外，还有一些实用性的汉藏语言学作品问世，比如洒睡宣化《上发表的“汉藏合璧实用会话”、供于蒙藏 30 个见习名词之解释”等，这些作品极有助于人们学习和了解藏语的基本情况。

1937 年以后，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最不该让我们忘记的是一位已故的语言学家，他就是曾经荣获牲国远东博古学院院士”称号的闻宥（在宥）先生（1901—1985）。在刘洪记、

孙雨志(1999)的统计中,本时期藏语言及相关文章共有28篇,其中就有14篇是闻有先生之大作,整整占了全部论文的一半!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们谨此将这些篇目列举如下,就足见建国前我国汉藏语研究开创者之一闻有先生当年在藏缅语言研究中辛勤耕耘的足迹了:

- 1、若干东藏方言中添首字音与前置字音之音变提要)(《仲国文化研究汇刊》I, 1, 1940)。
- 2、论汉藏语中 m>ñ之演化 The m<ñ Development in the Sino-Tibetan Philology)(《中国文化研究汇刊》I, 2, 1941)。
- 3、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 (A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ang Language in NorthwesternSzechuan)(《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II, 1942, 页 38071)。
- 4、西藏缅甸系语文略说——附表 Aperu desecritures et des Languages Tibeto — birmaniques)(《边疆研究论丛》)1, 1941, 页 1—7)。
- 5、论汉藏语族中若干 T>M之现象 SomeNew Light on the T. >M.Development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中国文化研究汇刊》II, 1942, 页 281—289)。
- 6、纹川瓦寺组羌语音系 Phonology of theCh'iang Language, Group I; Wa—gsod Dialect)(《仲国文化研究汇刊》III2, 1943, 页 293-308)。
- 7、嘉戎语中动词之方向前置及其羌语中类似(英文: Verbal Directive Prefixes in the JyarungLanguage and their Ch'iang Equivalents)(《中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III, 1942, 页 11—20)。
- 8、理番语二枯羌音语系 Phonology of theCh'iang Language, Group IV: Hou—erh—k'u Dialect)(《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IV, 1942, 页 111—138)。
- 9、论嘉戎语动词之人称尾词 Personal Endings of the Verb in the Jyarung Language)(《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I, 4, 1941 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IV, 2, 1944, 页 79—94)。
- 10、若干东藏方言中添首字音与前置字音之音变(英文:Phonetic Changes of the Superadded andthe Prefixed Letters in Eastern Tibetan Dialects)(《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S), V, 1945, 页 1—22)。
- 11、论唐蕃会盟碑中所见之藏语前置子音与添首子音 Superadded and Prefixed Letters in Ancient Tibetan Seen in the Lhasa Inscription A.D.822)(《中国文化研究汇刊》V, 2, 1945, 页 19—23)。
- 12、羌语方言中若干字音之来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VI, 1947)。
- 13、藏语语音学的研究德格地区)(《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VII, 1948)。
- 14、记西昌羌语的元音(《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VIII, 1948)。

罗常培先生的论文,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上一节所提及的藏缅族父子连名制研究方面的三篇文章,它们是“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竺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这三篇论文从藏缅族父子连名制的姓氏习俗入手,用语言学考证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了藏缅族的宗族、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关系和特征,是公认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发端之经典作品。

其他重要的语言学论文还有如丁辅伯浪语汇订”、李方桂的“沙佛藏汉语系的元音”、韩儒林的叭思巴字大元通宝跋”、任乃强的“吐蕃译变之辅射”、金鹏的“古藏语中由 rij 所组成的复纽在现代语中衍变”和余敏的叹语的‘其’跟藏语的 gyi 等,其中任乃强之文考究 Bod 一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发音之历史渊源;而俞敏之文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典范作品。

## 二、书籍

语言文字类的书籍,在1937年以前虽然有几本出版问世,但大多不是藏语言文字方面

的学术专著，主要是藏文字典、词典，藏文读本等。现代意义的藏文字典的编撰，首先出自西人之手。英国殖民主义的走卒和干将查尔斯·贝尔在印藏地区工作 20 来年，精通藏文，谙熟藏事。一生著述很多，其中除历史地理、探险游记外，还编著了《藏文字典》和《藏文文法》。此外，法人古德诺也曾编撰过《藏文字典》。这些作品，一方面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成吴”，一方而对国人是一种刺激，它们促动了当年有志于边疆研究和图存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

于是，国人也不甘落后，在借鉴西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励精图治，努力撰述，填补中国人在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中的空白。杨质夫的《新编藏汉小词典》和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的《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相继出版。尽管为数寥寥，但至少空谷也有几声回音了！它们逐渐开启了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之门。其中《新编藏汉小词典》专供汉人研究藏文，或藏人研究汉文查检之用。其取材多半选自达斯（1849—1917）的《藏英大词典》，而以《四体合璧文鉴》、《泰藏字典》及其他藏文辞书为参考。所收之单字及词语，以普通运用者为限。凡专门名词、佛学术语，概未收入。藏文单字不过五千，通常运用者，两字以上之词为数较多，本书所收两字以下之词约一万左右，注以汉字意；三字以上之词概未列入。此外，此书藏文拼音稍繁，且多复音字，不能以汉文注音。本书词条排列之序，以 30 个藏文字母为准。

尽管学术专著寥若晨星，但我们必须提到两颗闪亮之星：

（1）中国藏学的开创者之一于道泉先生（1901—1992）译注《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1930 年发表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 5 出版。此书原著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15 岁以前一直住在其家乡——西藏南部门隅地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因其家族世代信奉宁玛派，该派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所以他逐渐养成自由的爱情思想。而格鲁派却严禁僧徒结婚或接近妇女。后来身为达赖喇嘛，现实与原有的生活理想相互冲突，有一些违背清规戒律的行为。仓央嘉措 24 岁时圆寂，他短暂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其中大多抒发男女之爱。故而人们称其作品为情歌。其诗歌反映了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与舍弃今生但求来世幸福观念之间的矛盾心理，反映了他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佛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仓央嘉措情歌韵律结构上，除了少数是每首 6 行或 8 行外，一般是每首 4 行，每行 6 言（也称“谐体”）的民歌形式，节奏响亮、朗朗上口、便于吟诵，故而流传很广。

除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数量颇多，版本各异，国内已有十多种汉文译本公开发表，于道泉先生译注本共收 62 首，藏、汉、英三种语言对照。编选时主要根据西藏拉萨本和印度藏学家达斯选本（附录中录有达斯的《藏文文法初步》）。本书除了情歌本身的价值外，选编者翻译和注释的学问工夫溢于字里行间：

首先，此书英语译文和汉语译文都字斟句酌，准确贴切而又朴实流畅，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文风格，堪称一流的译文，诗歌翻译的典范。

其次，此书的国际音标注音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的杰作，为国内外所注目，当然也为此译注本增辉不少。

再次，此书在编排上十分精巧细致，甚有价值。全书目次如下：译者序；本书中星号“\*”的用法说明；目录；注音说明；译者小引；小引附注；情歌正文；藏文校勘记；读音变化说明；达斯氏藏英字典中未载之字；达斯氏字典中解释不恰当之字（以上仅有英文）；译文附注；附录（以上各项均是汉英对照）。其中不但应用了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手段，而且此书堪称对勘研究的典范之作。对达斯字典的纠谬也是编著者的一大贡献。

最后，此书最为精彩和颇显功力之处在于正文部分的处理：情歌每句都分八行并列，第一行是情歌藏文原文，第二行是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是逐字对应的单字汉译，第四行是全句的汉文译文，第五行是罗马字拼藏文，第六行是藏语罗马字，第七行是逐字对应单字英译，

第八行是全句的英文译文。这样的处理，不但便于研究者使用，而且便于一般读者学习藏文时参考。

此书形式上是藏语诗歌的翻译注释，本质上是藏学研究领域语言学、词汇学、语音学、藏语文学、对勘研究等方面综合研究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藏学的第一部专著”。

(2) 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语言学界十分熟悉的一部作品，它就是罗常培先生(1899-1958)在1933年出版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此书是“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别是关于汉藏对音的一部专著”，是第一部运用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汉藏语言的杰作。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五种汉藏对音材料，与《切韵》相比较，推溯其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以“探讨它们的流变”，多有创见，发现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很有些前人没说过的特点”(见此书“自序”)。此书既是语言学领域的经典，也是藏学、敦煌学方面的杰作，它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和诸多学者的友情，据罗常培先生在“自序”中所说，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中就有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林语堂、钱玄同、魏建功、罗膺中、丁声树等诸多名家。

1937—1949年，出版了十多本书，但多数仍是词典和语法书。张怡荪教授主持的西陲文化院以编撰辞书为主要任务，为藏语及汉藏双语辞书的编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藏汉大辞典》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词典编撰，有如黎丹的《汉藏辞典》李荫亭的《汉藏字典》，张煦等编的《汉藏语汇》、《汉藏集论词汇》、《汉藏语对勘》和《汉藏译名大辞典》，高凤西编著的《五凤苑汉藏字典》等，其中高凤西的《五凤苑汉藏词典》较为重要，顾吉页刚先生曾为之作序，并予以了较高的评价。

藏文文法方面，有西陲文化院编印的《藏文书牒轨范》，黎丹的《西藏文法》和《西藏语法》，释安东的《藏文文法》，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的《藏文读本》和《藏文文法》等。其中法尊法师的《藏文读本》分8册，每册40课，从藏文字母读法教起，迄于造句、作文与翻译。首列藏文，旁附汉字，课后有练习。其取材由浅及深，与内地小学国语课本略同，增加西藏乡土教材及佛教材料不少；《藏文文法》系以其师释安东著的《藏文文法》为蓝本，旁参悉都师徒之《三十颂广释》及法贤叔侄《略释福顶之读法》与《语灯》而成，其详尽精审，为国人撰著西藏文法之杰作。该书分为藏文之起源、藏文之依据、藏文与梵文删补之比较、藏文之书籍、藏文之读法(内分生处、助作与功用三节)、藏文组织及结论八章。藏文之组织又分整个字形之组织，与合名成句之组织两节，下再分科目述之，至为详尽。结论亦即绪言，略述著者学习藏文与编著本书之经过。